



张大千山水立轴纸本

□ 李秀潭

多年前，偶然得到两幅张大千《菩提贝叶彩绘观音图》。

在造纸术未传印度之前，古印度僧人用贝叶（菩提叶）书写佛教经文，称“贝叶经”，有“佛教熊猫”之誉，极具文物价值。中国书画家历来有利用植物叶面作书画的传统。张大千旅居南美期间，创作的珍稀菩提叶脉画，作为佛教礼品，被誉为“一叶一世界，方寸有乾坤”。

### 挹彼菁华创我丹青

张大千，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巨匠，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张大千终生勤于笔

砚，精于丹青，锐进不懈，血汗铸成名山大业，“南张北齐（白石）”盛誉名闻遐迩。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深爱其画。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赞之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作为一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天纵其才，在中国绘画的各个门类中纵横驰骋，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精。这除其本人天赋才情外，后天的努力和对于传统的继承，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期间，张大千远征西陲，于乱世中沉潜学习，长途跋涉到敦煌临摹石窟壁画。在荒漠石洞中面壁三载，绘制了276幅大小尺寸不同的画卷，包括天女、高僧、菩萨、梵女、金剛、供养人、因缘故事及建筑彩绘图案等，囊括了我国从4世纪到14世纪的历代造型艺术。敦煌之行，经过千年古迹之洗礼，使张大千的画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主要艺术特色是清新俊逸，那么自此之后，他的作品艺术特色就变为瑰丽雄奇。他的目光越过明清，上追北魏及至唐宋人的艺术踪迹，看到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境界。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他在敦煌的艺术实践。认为：“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开辟一新境界。”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张大千患糖尿病引起眼底视网膜扩张，视力突然下降，右眼几乎失明。眼疾成为张大千晚年的最大隐患。人的肉体生命有上坡，也必然有下坡，自然规律使然。而艺术生命在张大千面前，只有上坡，没有下坡。面对目疾茫茫，必须另出奇兵，重振威武。

他从古人《二十四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文论中得到启示，又从唐代王洽、宋代米芾、梁楷传统的泼墨技法中吸取有益营养，并借鉴畅游世界各国看到的西方绘画中光与色、明与暗处理的技法长处，加之博览中外名山大川，在此基础上，孜孜不息，大胆创新，自我扬弃，在泼墨画传统笔墨基础上创造出泼彩画法。在我国绘画史上，古人有泼墨法，而无泼彩法，更无墨彩合泼法。张大千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独创了泼彩法和墨彩合泼法，绘制出苍浑肃穆、宏大雄深、金碧辉煌的万水千山。张大千画风的这种演变，其过程和中国书画的变迁、他个人生命生活的变迁、世界绘画的变迁，都有息息相通的密切关系。正如他早年出家当和尚，松江禅定寺法师为他取名法号“大千”时所言：世界无量无边，宏广微深，包罗万有。告诫他要胸列万物，观广探微，将己之大千世界，融入世之大千世界，再将世之大千世界，返回己之大千世界。

### 乐操土风唯土物爱

张大千生活在清末以降近百年动荡变革的大时代，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沧桑。抗日战争初期，大千一度被困北平，身陷沦陷区。“悲欢事，中年剧。兴亡感，吾侪切”。北平之大，竟放不下一张画案。他深感国破之耻，家散之辱。在这风云板荡之际，他在哥哥和友人的帮助下，冒险逃离京城虎口，辗转天津、上海、香港，回到抗战大后方四川。在陪都重庆，他看到二哥张善孖画的28只与真虎差不多大小的《猛虎图》。图上题款

“怒吼吧，中国”！后面是四句诗：“雄大王风，一致怒吼，震撼河山，势吞小丑。”在哥哥的感召下，他们共同挥毫，创作了一幅《双骏图》，善孖画马，大千补景。图上说明文字是：“骏马，对祖国忠诚的象征。”

从北平古城回到家乡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安徽泾县，宣纸来源断绝。张大千自用的特殊定制的书画纸“大风纸”也即将告罄。为此，他到四川夹江县试制新一代夹江纸，并用夹江纸筹办了抗日义卖画展，将所得画款用于支援抗战。同时举办个人画展，筹集经费，已然把目光转向万里之外的敦煌。

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以往任何历史上所没有的巨大变革。大千从广州到香港举办画展，廖仲恺先生遗孀何香凝老人来港看望，并请他画张《荷花图》送毛泽东。荷花是君子之花，又是大千最擅长的画作。他在这幅长132厘米、宽647厘米的大画上题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何香凝也送他一幅《梅菊图》。在画左侧，何香凝女儿廖梦醒书写母亲一首七绝诗：“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存傲雪心。独向天涯寻画本，不知人世几浮沉。”

大千是处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代表人物。在这风云际会之时，大千仍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艺术以及与之有关的事情上。这个在艺术世界过惯了舒适生活的艺术家，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他几十年形成的人生哲学难以适应。最后，在各种因素影响下，离开中国，前往印度，后移居阿根廷、巴西、美国，开始了长期漂泊异域的生活。

大千作客他乡，但那时时思家

恋乡，浑切地怀念生于斯、长于斯、列祖列宗息于斯、子子孙孙受福于斯的故国，始终保持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习惯。投荒南美，他决定在巴西安家，按照中国庭园格局修建一座“八德园”。园中树木花草“必故国所有者植之”。亭园结构及园内布局完全是中国式的。室内家具，也是中国式的。他喝的茶、吃的饭菜，都按照中国传统方式沏煮烹饪。他身上穿的，是中式长衫，脚上着的，是中式布鞋。遇到父母老师生辰死忌，按中国传统礼仪祭拜。他按照中国的时间和习惯过年过节。他经常引用古语“唯土物爱”和《左传》上的话，“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教育子女亲属，保持中国的传统道德。他周游世界，觉得最可爱的还是祖国。他曾赋诗道：“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他身居国外，始终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他的一位久居海外的亲属深有感触地说：“在国民党偏安台湾，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处于敌对的岁月里，大千千像一个超然的‘文化大使’，独自在海外展出书画，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宣扬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拂髯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

历史车轮驶进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改变、情况的变化，年逾古稀的张大千赖以作为精神支柱的思乡怀土之情，变得愈加强烈、深沉、孤苦。“珍重余生能有几，且揩双眼看沧桑”。为了排遣思乡愁绪，借物咏怀，他不顾年迈力衰，绘制成五尺多长的巨幅山水长卷《长江万里图》。长江，是他度过少年、青年、壮年岁月的父母之乡、衣食之

邦，是他祖茔所在，父母长眠之地。大千通过这卷巨幅鸿制，寄托的是深厚的思国之情，体现的是对祖国的拳拳之心。他的老友、著名画家叶浅予看后评论：论景是千山万壑，气势宏伟；论意是寄情山河，缅怀祖国。处理宏大的布局，寄托浑厚的思国之情，不是一般的“胸有丘壑”的山水修炼所能胜任，必须具备气吞山河的胸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才能完成这件中华民族象征的伟大作品。

在他晚年，大千在画上曾经盖一白文印章“己亥己巳戊寅辛酉”。他用干支纪年表示四个时间。分别是1899年他出生的时间；1929年他作品第一次参加全美展的年份；1938年是他逃脱日本侵略者虎口，从北平返回四川的岁月；辛酉年是1981年。年逾80已届耄耋之年的张大千，益发感到自己时间不多，生命最后时光之可贵，要抓紧人生最后的岁月，再画一两幅能传之后世的不朽作品，做一两件有益人世的事情。于是，在他刚度过83岁寿辰后，就产生了“画我心中庐山”的想法。庐山，是中国大地上的一颗明珠，是心中祖国的象征。他要以终生的经验、学识和艺术创造力，抒写对故国的思念，绘出能流传久远的巨作。经过一年多的搜集资料，作腹稿预备处理，1981年7月7日正式开笔。这幅长108米，宽18米的巨幅山水画，以实笔为主，泼墨为辅，气势磅礴，虚实相间，墨绿相映，堪称旷世奇作，名曰《庐山图》。这是张大千画艺的巅峰之作。也正是这幅巨著耗尽了他的最后生命。作画期间，多次心脏病发作，经医院抢救，稍能恢复又重新上画案，医生家人都劝不住。直至1983年3月11日画成落笔，才驾鹤西去。

大千大师，人如其名；大千世界，瑰丽多彩。大千离开了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失去了大千大师。寿念大师，其艺长青，其节长存。


 未已斋札记

## 开栏语

跌到谷底的反弹力，公布武、穆公定策、献公比登临顶峰的能力更加重要，人是如此，家国同一，回望秦国崛起之路，襄公教周、文公献周、武

历代变革是在变之中有不变的节奏，这个不变就是要达到自我图强、统一天下的目标。从本期开始开设“秦变”栏目。

# 秦国的第一桶金

□ 崔 庆

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献公、孝公复兴穆公西河之梦，都是风光无限。但回溯秦史，襄公坚韧不拔，草创基业，不仅使秦走出惨痛的低谷期，而且获得家国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那是一段刻骨铭心、激情燃烧的岁月，凝结其中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秦人。

襄公接手的是一份风雨飘摇的家业。秦人先祖是周朝在西方的重要藩屏。周孝王时代，秦人分为犬丘大路和秦赢两大支流。西周后期，戎狄强盛，周王室对于关中的控制力迅速衰减。周厉王时期，犬丘大路被戎狄灭族。周宣王初期，襄公的祖父秦仲血洒疆场，死于征讨戎狄的激战。秦人的两大力量都遭受沉重打击，只剩下了星星之火。

此时，秦已经无力单独抵抗戎狄。襄公的父亲庄公在周朝七千人主力兵团支持下，击败戎狄，收复犬丘大路和秦赢的土地。但这只是微弱的胜利，而且主要是依靠周的力量。对于秦而言，局势并不稳定。有感于戎狄的巨大威胁，庄公长子、襄公兄长世父主动放弃继承权，专注于对戎狄的军事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襄公扛起了家国重任。在西周末期风云莫测的乱局中，只有活下来，才能站起来，强起来。

襄公继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外部环境安定下来。经过深思熟虑，秦醒悟到，戎狄强大，但部落众多，必须区别对待、分而治之。襄公元年（公元前777年），襄公把妹妹缪嬴嫁给了西戎丰王。丰王是重要的戎狄部落，秦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战略支点。

完成这一联姻后，襄公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更大的挑战很快来临。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西戎联军突袭秦的大本营西犬丘，此时襄公不

在，秦的头号猛将世父全力反击，最后还是战败，被西戎俘虏，这几乎又是一次灭顶之灾。

戎狄不是铁板一块，庖丁解牛，重在肯綮。襄公的提早布局发挥了作用，秦展开了对世父的营救行动。世父被俘，但没有被杀。一年之后，秦和戎狄达成了重大谅解，世父被安全送回。秦究竟是如何分化戎狄的，史料中已无记载，但是根据结果可以推断，秦有效利用了戎狄部落之间的不同意见，维持了当时脆弱的外部发展环境，在微妙的平衡中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

西犬丘被袭，世父被俘，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此时的襄公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回救大本营？问题的答案隐藏在秦的总体战略之中。襄公不在西犬丘，极有可能是亲率秦军精锐，向东跨过了限制秦人发展的陇山，对渭水上游的开水流域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以求获得一块真正属于秦的平原。

西周末期，秦的势力范围还囿于陇山之西，丘壑纵横的领地无法支持农业发展，也就无法支撑强国崛起。西周以后，农业成为先进产业，农战的概念不断发展。只有占有水源充足的平原地区，大力发展农业，才能真正提升发展质量。秦人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陇山以东的汧渭流域平原。襄公和其后的文公都坚持积极东进的总体战略。

通过对汧渭细致全面的了解和与西戎丰王等戎狄部落的密切交往，秦为东进默默进行着积极准备，襄公护送周平王东归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秦人受到戎狄打击只是序曲，周朝和戎狄矛盾在周幽王时期全面爆发了。周幽王对内渐失民心，对外轻举冒进，公元前771年，为褒姒而烽火戏诸侯，身死骊山之变。乱军之中，周幽王的太子宜臼被母亲所属氏族首

领申侯拥立为周平王。

周之不幸，秦之大幸。敏锐的襄公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襄公救周救的是谁？襄公作战对象是谁？对此，一直以来多有不同意见。为了让秦的利益最大化，襄公救周很有可能救的是周平王；秦军的作战对象很有可能是力图控制周平王的申侯势力。周幽王尽失人心，救周平王可得拥戴之功。攻击申侯，既是对其勾结戎狄的惩罚、伸张正义，又可以削弱周平王在西部的支持力量。申侯溃败，平王东归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经此混战，镐京残破，周平王决心东徙雒邑，襄公护送平王东归。周平王封襄秦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并承诺，“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正式成为诸侯国，并且获得了攻伐“岐丰之地”的许可，战略架构空前提升，填补周朝东迁空白成为可能。

秦得岐丰之地，有如后世刘备得荆州，获得了深度发展的第一桶金。岐丰之地，一片沃野，适合发展农业，既满足了扩大秦战略纵深的需求，也满足了推行农战的需求。襄公十二年，襄公再聚精锐伐戎，可惜天不假年，出征未捷身先死。襄公既有奋发图强的锐气，又有谋定而后动的沉勇，这些品质凝聚成秦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难在起步。襄公深刻把握住了战略机遇，维持了平稳的发展环境，为秦国崛起舒筋展骨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历史转了个弯，来到世人面前，那是什么感觉？这是笔者双脚踏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脑海中闪现的一个念头。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拾阶而上二楼，其右侧为亚洲艺术展区的中国展区，一跨进去，眼前顿时洞开了一扇历史之门，如此熟悉，又如如此陌生。这里的展厅有1.2万件来自华夏的艺术瑰宝，几乎囊括了中国历代的文物大类。

### 造像风流落异乡

笔者久久伫立在一块残缺的石刻浮雕前，这块残缺的石刻浮雕名曰“北魏皇帝礼佛图”，但真正的名字应为“北魏帝后礼佛图”。礼佛图位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宾阳”取迎接初升太阳之意，是公元500年时，北魏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以及文昭皇后做功德和新求冥福而开凿的，前后历时24载，是北魏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洞窟，也是我国雕塑史上的奇观。

其整体分为北南两段，展现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率皇室宗亲礼佛的恢宏场面。北段雕刻的主体是孝文帝。他头戴冕旒，身穿衮服，在诸位王室贵族以及文武百官的陪伴下，以御林军为前导，并在手持伞盖、羽葆、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妹女的簇拥下缓缓行进。南段雕刻的主体是文昭皇后。她莲冠霞被，一手拈香，身后跟随着两个戴莲冠的贵妇，由众多宫女前呼后拥地徐徐前行，方向与孝文帝相对。但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厅，人们看到的却是残缺的孝文帝部分。由于盗运来时，浮雕是逐块粘对复原的，留下了盗凿的痕迹，再加上并非全景浮雕，其恢宏的气势也大打了折扣。

如果还原一下历史，就需要解读普爱伦这样一个美国人。他既是一个文物学家，又是一个文物贩子。历史偏偏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1928年当上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翌年，普爱伦来到中国，做起了收购和盗运文物的勾当。他来到洛阳城外的龙门石窟，一眼就看中了宾阳洞壁的《北魏帝后礼佛图》，不禁为其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所震撼。他在洞中拍下大量照片，又找到古董商入岳彬，先后交付了1.4万元佣金。见钱开眼的岳彬贿赂了洛阳官员，并指使流氓潜入宾阳中洞，对

照普爱伦提供的照片，硬是将《北魏帝后礼佛图》的主体一块一块地凿下来。这伙人将浮雕石像凿下之后，偷运到北京，交到了普爱伦手上。之后，普爱伦又远涉重洋将其运送到美国。被盗凿的《北魏帝后礼佛图》是分块拼接而成，分成了两部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现存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龙门石窟的宾阳中洞由于被挖去“帝”与“后”两组礼佛图，失去了整个雕像群中心和最精彩部分，从而千疮百孔，空余凿痕。

### 三彩罗汉成异客

我不禁在想，国宝的流失难道仅仅是因为西方列强对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所致？恐怕也与国内某些古董商家以及见钱开眼的官宦之流为虎作伥不无关系。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着一尊易州三彩罗汉坐像，是1912年由北京两名古董商向德国汉学家贝尔契斯基兜售的。贝尔契斯基获悉这尊罗汉坐像出自河北易县八佛汪的清西陵永福寺后，就借养病为名，住进了八佛汪附近。他带着随行的中国通和摄影师，雇用当地向导两度近距离“考察”罗汉坐像。他被造像高超写实的魅力所倾倒，便谋求收购这批瑰宝。不想，这事走漏了风声，让当地官府知道了，官府逮捕了一批盗运藏匿罗汉造像的文物贩子，包括贝尔契斯基派去的古董商，就连永福寺也遭遇了搜查。可若以此便认为官府是秉公执法就错了，原来，那些县衙官员，本身就是监守自盗，他们的行动只是担心利益外流而已。果然，在贝尔契斯基几经试探后，利欲熏心的官员露出了真面目。据贝氏所记，县衙曾保存有两尊罗汉，地方官虚与委蛇，明面上声称要将罗汉安置供奉于庙宇，私下却暗示他，造像可以善价而沽。最终，贝尔契斯基如愿以偿，获得了一尊完整的三彩罗汉坐像，卖给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另一尊罗汉的碎片其后则不知所终。这就是当年中国的国情与现实，让今人不禁扼腕叹息。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饱受蹂躏，遭受内乱与外敌入侵之患的苦果。国破家何在？文物又安在？许多文物就是这样，很轻易地被贩卖到国外，国宝

一个历史时代的泣血记忆

□ 剑 钧

大量流失。如果说，大都会博物馆始建之初，还主要是靠收藏家的捐赠立馆的话，那么，后来就开始乘人之危，有目的地在全球搜寻文物。在中国，他们通过代理人，与中国的鉴定家、古董商密切交往，收购大量文物。

历史是复杂的，今天我们不好评论这些收藏家的行为到底是对中国艺术宝藏的掠夺，还是在战乱中为保存下这些艺术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这种肆意搜刮中国文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至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那张门票还保存在我的抽屉里，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的是散落在异国他乡的件件国宝，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泣血记忆。

有所思